



新上海人对老上海慈善家的回馈

张济顺

成长初始，常听父母提起一位沪上有名的慈善家，是张家的亲戚。童年的我不知这位“黄家公公”叫什么名字，也搞不清有哪几位张家长辈与黄家结亲，只是颇为好奇地发问，“慈善家”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但在激进与蒙昧壅塞了头脑的青少年时代，老城厢的家族与所有沾亲带故的往事渐渐从我的记忆中丢失。

好像历史有缘。时隔近七十年，包括黄涵之在内的上海慈善家被阮清华著《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召唤回来。

流行多年的“现代化叙事”虽已受到批评，近代上海慈善史研究仍多取径于此。这本书着墨的“传统”，不是去刻意渲染近代上海慈善组织之传统因素，或过分夸大老上海地方精英兴办慈善的“丰功伟绩”，而始终围绕着起自老城厢的民间慈善组织如何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相遇共生这一主题，发掘调适与创新中的坚守与传承。书中揭示：传统的民间慈善善会一方面主动适应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样态、情势与结构，厕身其中并再造自身，一如书中论述的“庚子救援”、模范工厂游民工厂的创建，皆是传统慈善组织赈济

施善的新尝试与现代经验的借鉴吸收；他方面，传统路径与方式在筹措资金、善举内容以及解决权益纠纷等方面均有沿革，尤其是与都市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民间慈善资金的网络化，其由内而外“三个层次”组成的“同心圆”结构，依然与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颇为相似。而坚守这份传统的，不只是数百个上海民间慈善组织中的那些“百年老店”，也包括众多的“后起之秀”。那群老城厢的创业及后继者，亦不断地与“大门口的陌生人”结盟，联合各路善人善会，继续执沪上乃至全国民间慈善事业之牛耳，并在五方杂处、阅历各异、身份有别的慈善家群体中不断地再塑自己。

讨论民间慈善事业，另两个绕不过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以及公共范围（public sphere）或“公共性”。虽然数十年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国不存在哈贝马斯所定义的“公民社会”，但并非不存在官方及民间皆参与的“公共领域”与自治组织工具；许多学者也认同国家与社会的“未定边界”及“彼此嵌入”的主张，然而，对社会“自主空间”和“底层反抗”的优先关注或着力过猛，还是导致不少探讨民间社会的史书堕入“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陷阱。《慈航难普度》则立足于民间慈善活动实态与动态的细致描述，善团与政府间彼此警惕、控制与反制、依存与合作，行善者与施者的共存与冲突、事愿相向与相悖均得到充分而生动的展现，国家行政、民间慈善组织、受施与索施的弱势群体三者关系的张力与限度，清晰地揭示出来。书中第六章“慈善与产权——‘寄枢所风波’”的叙述与分析，尤发人深省。在这个苏北难民抢占“鬼屋”的故事里，维权与侵权、公产与私领、“募民”与“义民”、“勒迁”与“拒迁”，充满了善会寄枢所、市政厅及其下属机构、苏北难民三者间的来回撕扯，论辩博弈，几近暴力边缘。事

件之结果，苏北难民的侵占行为为得逞，“弱者的武器”确乎有效，但正如书中所论：“寄枢所风波”既是难民自我表现、自我肯定的形式，也是地方政府、地方精英与底层民众的一种“合谋”。唯其如此，才可能出现三方虽有长时间的逼迫、勒迁与反抗，却依然维持基本相安无事的结局。难民的表达，正是借助与精英的“合谋”，才得以实现和留存，尽管这种合谋是在三方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底层的表达正是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中得以产生并影响事态发展，也唯有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表达才有可能。

尽管像这样的“合谋”与“相安无事”在近代上海慈善史上并非个例，但更多的是平静表象下的暗流涌动。作为“善人之网”的群众基础，受施者转身成为消弭、瓦解甚至破坏慈善网络的力量；政府管控的失度，一方面纵容或激化底层民众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也抑制了民间慈善家的积极性。而从传统蜕变而来的慈善家们，面对大众媒体动辄曝光揭短，甚至无端谴责，极为不安与无奈；面对来自政府机关促其法制化、规范化的各种条条框框，繁琐复杂的程序，更不胜其烦，兴建慈善组织的热潮渐渐消退。由此，“慈航普度”之难留下一个颇具现实性与普适性的世纪诘问：“这个度在哪里，需要双方不断对话，不断试错，而后才可能找准。但若政府过弱，监管可能流于形式；政府过强，‘民人无以置喙’，则可能两败俱伤。此一难题，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深思，更值得继续探讨。”

掩卷沉思，借用吕芳上先生之语来结束此文：“要知道历史的传承有如父母子女，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子女要回馈的是生命的意义。”确合此言，这部书承载的是一个新上海人对故乡乡亲父老养育之恩的深情回报，捧出的是一份对远去都市与老上海慈善家风雨普度的厚实回馈。

（作者为复旦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

曦园比邻 一生知己

苏兴良

1965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复旦中文系当教师。在30多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和贾植芳教授、陈思和教授合作，结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贾先生与我父亲同庚，我比陈思和长16岁，我们可算是三代人的亦师亦友。

全国恢复高考后，复旦招收的第一批学生1978年春季进校，陈思和是其中之一。当年我给中文系文学专业新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陈思和担任这门课的课代表，我与他的接触就密切多了，他有时来我家里，我也曾到他的黑水斋做客。但更多的是我们不约而同相遇在贾植芳先生家里。我们都把贾先生视为导师。1979年贾先生重回现代文学教研室执教，我与陈思和两人日渐成为贾府的座上客，有时还在贾先生家里蹭饭，贾先生家里的家务活例如搬家、房屋装修，我们也尽力帮忙。正如贾先生在给陈思和所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所做的《序》中所说：“我和思和是十多年的老相识了。虽然我们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但我们能一见如故，声息相通。”

我与贾先生的相识还要早一些。“文革”期间，我们都曾在复旦奉贤干校劳动，而且是在一个排，我任排长。贾先生那时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监督劳动。五十多岁的他，身体虽然瘦弱，但挖河、翻地、挑担等重劳动绝不少做。我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少挑点。”他总说“我行，我行”。有时发补助粮票，我也背地里塞给他一些。谈起干校那段生活时，贾先生风趣地说：“老苏那时很人道”。

1979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写一套“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作为国家六五科研项目发放到全国重点高校和社科单位认领。我认领了“文学研究会资料”，贾先生认领了“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这年12月，文研所召开该套资料丛书编写会议，贾先生和我受邀参会。会后，贾先生带我访问了茅盾、冰心等一批当年文学研究会的作家，还到北京一些高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回校后一起编辑《文学研究会资料》（上、中、下册）。稍后，我又参加由贾先生与陈思和担任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上、下册）和由贾先生领衔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两书的编辑工作。这些工作使我们三代人结成了终生的师生情谊。

陈思和在学生时期就勤奋好学，他和同班同学李辉志同道合，尤其对巴金小说产生浓厚兴趣，在大四时合写了长篇小说《试论巴金的早期无政府主义》。我推荐给北京的核心刊物《文学评论》杂志，不久就刊登了，这对两位在读大学生无疑是很大的学术成果与激励。陈思和、李辉两人在贾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巴金，相继推出论著《巴金论稿》、《人格的发展——巴金传》，贾先生为这两部书写了《序》，予以很高评价。以后他俩成为著名的巴金研究专家，以优异的创作成绩回报了贾先生的培养。

陈思和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教学研究。这样，贾先生、我与陈思和三人就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交往就更密切了。贾先生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一批又一批，新著一本本出版；陈思和于1993年评为教授后，也带了多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后来还担任过中文系的系主任。他担任编委会主任于2004年编辑出版了四卷本《贾植芳文集》。该文集出版后，贾先生赠送给我一套，亲笔题词“兴良老友存念”。2008年贾先生逝世后，陈思和编辑出版了《贾植芳先生纪念集》一书，收入了我缅怀贾先生的文章。后又主编出版了精装《贾植芳全集》十卷本。

1988年贾先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时，就约我为该书写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会》，后来还约我写了《也谈文学研究会会员》等文章。我学习日语时，贾先生给予我很多鼓励。他每出一本书都签名送我留念，我也写过缅怀贾先生的文章《解冻时节赴京华》。

陈思和担任上海作家协会和杨树浦区作家协会的副会长和会长，我则是这两个协会的会员，感到格外亲切。在贾先生和陈思和的影响下，我也没敢懈怠，不仅新学了日语，平时也笔耕不辍，先后编写、创作出版了十本著作，以不辜负贾先生和陈思和对我的热心帮助与期待。

日月倥偬，一晃我与贾先生、陈思和教授相识相知，已经有四十多年了。贾先生虽然于2008年病逝，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退休后与陈思和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见面，他都热情打招呼、亲切问候。去年我把一位文友的处女作推荐给他，他很快就在《杨树浦文艺》上发表出来，以不负我的心意。

我们三人之间亦师亦友的真挚友谊，将会永远存在。

（作者为中文系退休教师）

书画光影



咖啡暖心

今天在外留学生工作处享用了一杯美味咖啡。Lily老师说这个小间可以让前来办事的同学在等待过程中，随性享用一杯咖啡。

这个小间是2017年12月利用杂物间改成的，咖啡机和豆子是捐赠来的。

小小的“咖啡吧”，更是“每日”接待服务学生的值班室，氤氲的咖啡香，或可化解留学生身处异域的乡愁吧！

图文/薛海霞